

日 中 関 係 史

(1972~2012)

[日] 服部健治 丸川知雄 主编

步 平 张季风 审校

张季风 叶 琳 译

日中关系40年史

(1972~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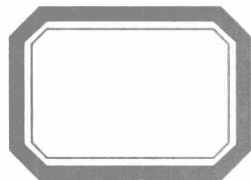
Ⅱ 经济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日 中

(



〔日〕服部健治 丸川知雄 主编
步 平 张季风 审校
张季风 叶 琳 译

日中关系40年史

(1972~2012)

Ⅱ 经济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出版前言

2008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学者编撰的《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一书，以中国学者的视野全面审视了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 1978 年至 2008 年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在中日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因应此书的出版，当时日本中日关系研究界的学者即提出也要编撰一部同样主题的研究专书，以反映日本学者的观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 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日中关系 40 年史（1972～2012）》（『日中関係史 1972～2012』三卷本，2014 年又增加了民间交流卷，共为四卷）。

由日本学者高原明生、园田茂人、服部健治、丸川知雄等领衔编撰的《日中关系 40 年史（1972～2012）》，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间交流四卷，以日本学者的视野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自 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至 2012 年间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既有一般情况的叙述，也有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并进而在所论列的问题上阐明各自的观点。按编撰者自己的说法，这是日本学界在日中关系研究领域“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世界上的两国关系史，很少能得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果检视日本学界有关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成果，应该说此言不虚，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论述问题之深入，完全可以视为日本国内近 40 年中日关系研究的集大成者。参与本书写作的，除几位领衔者外，多为年轻学者，他们在所研究的领域多有所建树，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视为未来日本中日关系研究界的中坚力量。因此，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其具体的观点，作为学术研究和现实应用的参考，了解他们的看法和观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中日关系正处于自恢复邦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低谷，从严谨的学术立场，总结中日关系 40 年发展的历史，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学者有此义务和责任。出版者也有义务和责任，即将基于严肃学术立场、在学术层面上客观阐述自己观点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时出版，介绍给学界，以推动

研究的深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间交流四方面内容，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性考察的专书，可以说充分反映了日本学者对40年中日关系的认知，相信对于我们全面观察中日关系、准确把握中日关系之关节点，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健康发展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本书的基本考虑。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学术、尊重作者的原则，尽量按原书将作者的叙述和观点完整、准确地翻译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事实上，对于不少问题中日学者间是有不同看法的。对此，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们采取加译者注的方式说明中方的习惯表述，并对文中所引的资料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按照我们的出版要求，对一些章节中确需改动的表述，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做了修改；个别文章也有删除字词句甚或段落的，以删节号标示。遗憾的是，政治卷三宅康之先生所写的第八章和阿南友亮先生所写的第十五章，因对文章的修改未能与两位先生达成一致，最后只能忍痛割爱。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支持。长期以来，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在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2008年由中国学者编撰的《中日友好交流30年（1978~2008）》一书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出版的。对此我们表示敬意和衷心感谢。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日方的诸位学者，感谢诸位学者同意将研究成果交给我们出版，以及在书稿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所给与的协助。我们还要感谢东京大学出版会，因为有前期日文版出版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使我们能有一个较为规范的文本来进行中文本的翻译出版工作。

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非易事，远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具体到本书，参与写作的学者不下50人，论述的时间跨度也不止40年，许多问题多涉及恢复邦交之前；加之论述内容范围广，引用中日档案文献及其他材料极多。单是不同作者引述同一材料而表述不一致的问题，就让编辑花费大量时间加以核对，而引用的许多中方材料，则须逐一核对，更是费时费力。尽管译者、编者尽心尽力，差误似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6月

付梓之际

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的日中关系从未像今天如此紧密。随着通信、交通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员和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化，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两国之间围绕政治和安全保障的紧张局面，反而在不断升级。在日中邦交正常化 40 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说，双方国民对对方抱有的好感度有所降低，双方依然存在许多没有消除的误解。

今后日中关系如何发展下去，不仅关系到两个国家，而且还会对地区和世界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东亚的日本和中国两个大国能够推动合作，彼此都将获得巨大的利益。另外，如果日中关系进步，那么东亚的国际秩序将会稳定，而该地区的繁荣会令全世界从中受益。然而，如果日中两国争斗不休，不仅双方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由于两国之间的紧张和对抗，亚洲乃至全世界也会受到负面影响。这大概在任何人眼里都是明白无误的道理。

日本人与中国人能否让今后的日中关系得到发展？在我们思考如何构筑未来、展望将来之际，必须以史为鉴。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样的人推动了日中关系的蓬勃发展？它走过了什么样的轨迹？在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正好 40 年的当下，分析和考察日中关系史的意义正在于此。

《日中关系 40 年史（1972～2012）》（共三卷）是综合把握和详细探讨日中关系的前所未有的一次尝试。

第Ⅰ卷“政治卷”部分，列举了从日中邦交正常化一直到日本民主党政权诞生为止的 40 年中两国关系的 16 个重要主题，并按各个主题分析了包括两国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在内的各种因素。第Ⅱ卷“经济卷”，仍然是按主题考察了在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中，日方是如何参与的，同时也加进了政府和企业相关人士的论述，对经济交流的成果和所存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第Ⅲ卷“社会·文化卷”，从“熊猫来日”一直到“池袋中华街”构想，列举了这 40 年中的一些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日中相互印象的变化及其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进行

考察。

本书各卷共同的基本主题是：日中之间不断扩大和深化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复杂化的利益与感情。考察日中关系的前提或者背景，既有社会制度、世界观，或者历史观、价值观的差异，也有各个时期全球和区域的不同状况。通过整个分析，也许我们可以理解日中关系所具有的坚韧性、脆弱性及其可能性。

世界上的两国关系史，很少能得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编撰本书时，我们想起了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同年，步平编辑代表、高原明生监译的『中日関係史 1978～2008』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应该说是本书的姊妹篇，是一部由中方研究人员编撰的现代中日关系史，同时也是让读者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范围内，中国的日本专家给大众提供了什么样的中日关系印象”（监译者序言）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原书也由政治卷、经济卷、文化教育与民间交流卷三册组成（翻译版本合为一册）。粗略比较来说，中国的研究著作资料比较详尽，而日本的研究著作则着重于分析，两者各有特色。在此，再次对给予日方启发的中国研究人员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希望各位读者一定要对两本著作进行对照阅读，以便了解得更加全面。

我们的尝试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读者的判断。在我们的编撰过程中，尽量注意进行学术的和中立的分析，但由于研究对象是距离现在比较近的历史，因此在事实的挖掘、推敲和探讨上，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给予坦率而有建设性的批评。

此外，我们希望像『中日関係史 1978～2008』那样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版本在中国出版，以便能够让中国读者准确地了解日方的看法。另外，如果本书能够翻译成英文，听一听世界的意见，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的策划、研究和出版，与『中日関係史 1978～2008』一样，是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资助项目。正是由于该基金的胡一平女士、玉腰辰己先生以及负责编辑的东京大学出版会的阿部俊一先生坚持不懈的努力，本书才得以出版。在此，谨代表编者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代表：高原明生

2012年8月

补 记

近年日中关系走入低谷。尽管双方各界人士都在竭诚竭力为改善两国关系寻找契机，但至今尚未出现良好的兆头。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作为对6年前出版的由中方学者联合撰写的《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的回应，由60多名日本学者共同执笔的《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4卷书的中文版今天能够出版，的确是一件令所有期待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人感到欣慰的事。值此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为这项艰苦的工作付出巨大努力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有关人士。

同时，鉴于中国国内的出版情况，中文版编者不得不将政治卷中的第八章和第十五章删除，并对其他篇、节的部分内容及表述形式进行了更改，这是令日方所有编者和执笔者感到十分遗憾的地方。我们衷心希望伴随着日中关系的逐渐改善及相关情况的变化，这部书最终能以再版的形式将删节的两章完整收录进来呈现给读者。

高原明生

2014年6月

经济卷目录

I 日中经济关系概观

- 第一章 邦交正常化以前的日中经济交流 // 003
// 岛仓民生
- 第二章 日中经济关系 40 年概观 // 012
// 服部健治
- 第三章 外交官眼中的日中经济交流
——回顾日中经济外交 // 026
// 松本盛雄
- 第四章 从经贸关系看日中经济关系 // 034
// 波多野淳彦

II 从实现邦交正常化到启动改革开放（1972~1978）

- 第一章 概论 // 043
// 服部健治
- 第二章 广州交易会的变迁 // 051
// 小岛末夫
- 第三章 《日中长期贸易协定》的缔结 // 057
// 小岛末夫
- 第四章 主要产业界的合作 // 063
// 服部健治 等

III 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南方谈话”(1979~1991)

- 第一章 概论 // 077
// 服部健治
- 第二章 对华 ODA 的开始 // 083
// 关山健
- 第三章 成套设备合同问题 // 094
// 小岛末夫
- 第四章 应对贸易不平衡 // 103
// 小岛末夫
- 第五章 主要产业界的动向 // 109
// 服部健治 等

IV 从“南方谈话”到中国加入 WTO (1992~2000)

- 第一章 概论 // 129
// 服部健治
- 第二章 大连工业团地 // 136
// 梅村贤二
- 第三章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 142
// 大西义久
- 第四章 投资现场面对的课题 // 148
// 服部健治
- 第五章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 // 155
// 梅村贤二
- 第六章 知识产权侵害 // 161
// 日高贤治
- 第七章 主要产业界的动向 // 169
// 服部健治 等

V 中国加入 WTO 以后的日中经济关系 (2001~2012)

- 第一章 概论 // 189
// 丸川知雄

第二章	针对个别日资企业的冲突事件及其背景 // 197
	// 渡边浩平
第三章	经济摩擦
	——第一次对华紧急进口限制、对日反倾销 // 203
	// 小島末夫
第四章	食品安全问题 // 212
	// 丸川知雄
第五章	环境合作 // 217
	// 长瀬诚
第六章	围绕研修生、技能实习生的日中关系 // 225
	// 冈室美惠子
第七章	对华 ODA（日元贷款）的终结 // 233
	// 关山健
第八章	主要产业界的动向 // 239
	// 服部健治 等

VI 未来的日中经济关系

终章	中国的经济大国化与日中关系 // 257
	// 丸川知雄

年表	// 265
----	--------

后记	// 277
----	--------

I 日中经济关系概观

第一章

邦交正常化以前的日中经济交流

岛仓民生

一 民间贸易协定的启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的11月30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①紧接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发展到最高潮的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同月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签署了“日华和平条约”。战后，日本重新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交流，注定要遭遇在东西两大阵营对决的紧张氛围中艰难起步的命运。

据称，战后日本船只为了开展贸易活动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地区的港口是在1953年4月27日。在此前一年的1952年10月，中国颁布了《日本籍船舶来港暂行办法》。其背景在于1952年6月1日缔结的《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存在。

这一协定是由参议院议员高良富、众议院议员帆足计（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和宫腰喜助（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理事长）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签订的。他们三位议员冒着违反《护照法》关于禁止前往社会主义国家相关条款的风险，经由西欧国家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经济会议（1952年4月），之后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从莫斯科前往北京，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日本议员首次访问中国（1952年5月）。我们不应该忘记坚持和平主义、活跃于国际舞台、国际意识很强的女性活动家高良富的功绩。她为实现被苏联扣押的日

^① 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译者注

本战俘的归国与苏联当局进行面谈，同时也为解决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归国等问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规定进出口总额为 6000 万英镑，并将商品清单划分为甲、乙、丙三种类型，采取同类物资相互交换的贸易方式。虽然是期限仅为截止到 1952 年底的 7 个月的简单协定，但《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勾画了之后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雏形，同时也成为开启此后日中经济交流的最初的协定。

1953 年 10 月末，前一年进行了改组的跨党派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派出了由池田正之辅（自由党）任团长的访华团，并签署了《第二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川胜传（大日本纺织的社长，后出任南海集团的会长）、弓削靖（柴油汽车的社长、汽车出口振兴会会长）等各产业界的大牌企业家也参加了这一代表团。在该协定的附属文件中，双方就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机构”达成共识。在这一发展潮流中，1954 年 9 月，日本成立了旨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活动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第一任会长由大阪商船的社长村野省三担任。

1955 年 3 月第二届鸠山一郎内阁成立，同意接待二战后第一批来自中国的贸易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副团长是当时被称为“民族资本家”的李烛尘。该访日代表团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签署了《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1955 年 5 月），决定由日中双方联合举办商品展览会。商品展览会于 1955 年 10 月和 11 月分别在东京的晴海以及大阪的中之岛举行。1955 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中贸易首次出现繁荣景象的一年。这一年，缔结了战后第一个民间渔业协定。另外，在日本通商产业省的暗中支持下，还成立了政府系列的“日中进出口组合”。在日本产业界占据重要地位的钢铁产业界也采取行动，并在 1958 年 2 月签署了《日中长期钢铁协定》。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正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 1962 年），开始进行重化工业建设。

在此数年前，日中实现了关于 29000 名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归国问题的谈判。1954 年 10 月，曾经作为中方谈判核心的中国红十字会的访日代表团（团长为李德全，副团长为廖承志）抵达了日本。

二 “政经不可分”与日中经济交流

在东西冷战时期，处于日美安保体制下的日本为了促进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不得不在所谓“政经分离”这一不确定且不稳定的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慎重起步。

在此，笔者打算对邦交正常化以前日中经济交流进程屡遭挫折的几个典型事例进行回顾，以探究“政经不可分”原则是如何阻碍日中经济交流发展的。

最具影响的事件是1958年5月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当时日中第四次签署民间贸易协定（1958年3月），在日本执政党内的一部分国会议员也开始出现推动日中经济交流发展的迹象，日中双方互设贸易代表处，甚至涉及是否承认这一代表处的外交特权和悬挂国旗等话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这一事件。事件的内容是，日本右翼青年扯下了在长崎百货公司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虽然日本青年被警察带走，但很快就被释放了。日本政府对释放行为的解释是，五星红旗是日本不承认的国家的旗帜，所以不是国旗，因而以极轻微的罪名释放了罪犯。

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严厉批判了刚刚接替石桥政权的岸信介内阁，并声明中断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1958年5月9日）。继这份声明以后，《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和《日中长期钢铁协定》宣告作废，渔业协定的延长被中止，正在日中两国城市举办的商品展览会突然停止，正在进行的各个领域的经济交易谈判也被叫停，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归国，贸易活动完全中断。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日中贸易额在1958年只有8000万美元，1959年跌至零。大部分的友好贸易商社都是零星企业，^①经营板栗、生漆、蔺草席、中药等无法从其他国家进口替代的产品的商社遭遇了毁灭性打击。顺便提一下，当时存在一种“照顾”贸易，专门经营来自中国的被称为“照顾物资”的商品，交易对象包括糖炒栗子、漆、桐油、麦秆、甘草、滑石和调味料等。

针对因长崎国旗事件而被迫中断贸易的事态，中国方面在1959年4月发

^① 零星企业，主要由业主及其家属经营的规模最小的企业群。——译者注

表了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1）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2）不搞“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能妨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①

除此以外，围绕扩大经济交流，中国方面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于1960年8月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可以认为，贸易三原则围绕日中贸易提出了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以及个别照顾等三种形态，在暗示发展的计划性和灵活性的同时，包含对零星友好商社和小规模企业的照顾以及与大企业生产厂家进行交易的期望。归根结底，中国方面将区别对待日中贸易，与个别商社采用“合同”制，与民间团体采用“议定书”制，与半官半民性质的团体采用“备忘录”制，与政府之间则采用“协定”制。

中国各产业领域的贸易公司，自1957年起联合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举办两次，春季和秋季各一次，通常称之为“广州交易会”（参见本书第Ⅱ部分第二章）。从1961年春季起，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广州交易会成为日本友好商社进行商业洽谈的场所。日本的一部分工会以及地方的与日中友好协会有关系的零星企业作为友好商社，开始从中国进口被称为“照顾物资”的优惠商品。这些友好商社当然是支持“政治三原则”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开始进行商务谈判之前，还会和中方谈判代表一起大声诵读“毛主席语录”。

再介绍一个日中经济关系中被迫践行“政经不可分”原则的事例。那就是所谓两份“吉田书简”所留下的教训。

一份是在日本国会审议《旧金山和约》的过程中，吉田茂首相发表言论称，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只不过是一个地方政权，结果刺激了美国的反共派。这被认为违反了《旧金山和约》关于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规定，成为大问题，要求取消发言。吉田首相给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去了信函，表示日本将遵照《旧金山和约》，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1951年12月）。

另一份“吉田书简”发生在1964年池田勇人内阁时期。当日本讨论利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对华出口成套设备的时候，针对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对日进行的批判，前首相吉田茂给“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寄

① 此“三原则”为周恩来在1959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针对长崎国旗事件，中国政府1958年7月即提出过“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停止反华言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不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译者注

去了信函，阐述了日本的“政经分离”原则，但也表示目前的对华出口将不使用进出口银行的资金。

三 走向 LT 贸易时代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这一东西冷战的格局中，世界形势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捉摸。这是因为中苏论战开始，同样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决裂。

更进一步，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国家危机，内忧外患相互交织。从南边来看，越南战争中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逼近中国的国境；在东部的腹心地带，台湾地区的蒋介石谋划反攻大陆，而且日本的佐藤荣作首相访问台湾；在北边，中苏边境将要发生武装冲突。此时的中国可谓四面楚歌，为国际社会所孤立。

从国内层面讲，“文化大革命”爆发，极左集团迫害中央行政组织的干部，国家机能处于麻痹状态。打算向海外寻求新技术、引进外资的人都被看作有“洋奴哲学”思想的人，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自力更生”是当时的口号，但这也显示了中国的孤立。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日中经济交流的扩大和邦交正常化在探索中向前推进。

1959 年 10 月，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双方就改善日中关系交流了意见，并确定松村顾问的盟友、前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为同中国进行联络的总负责人。《人民日报》刊登了对松村访华团寄予希望的社论。松村是与财界和权力保持距离的人。高碕早在 1955 年万隆亚非会议时就与周恩来总理有着知己情谊，也是二战前满洲重工业的副总裁。松村回国后，促成高碕访华。

1960 年 10 月，高碕达之助访问中国并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还发表了饱含着对改善日中关系的期待的送别演说。高碕访华时，正值同年 7 月岸内阁向池田内阁的政权更迭。岸内阁是坚持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方针的政权，而池田内阁则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重视经济政策的政权。

池田内阁开始表现出继续推行“政经分离”方针，事实上承认日中经